

觀察

· 分五角一份每 ·

· 日 月 九 年 七 十 三 ·

· 版 出 大 期 星 禮 ·

期 二 第



卷 五 第

信 通 察 觀

何其芳的轉變
文 藝

北平大拘捕(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南京大拘捕(南京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關中搶糧戰(西安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鄧錫候遲不赴任的原因
(成都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沈宗澂

燕京被搜在場談話

陸志韋

最完整的人格
哀 思
紀 錄

李廣田

文明在生死之間

Arnold Toynbee

紅帽子在美國
外 輪 選 譯

段 連 城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美 國 通 信

張 東 蓀

特稿連載

論政府大捕學生
從幾個世運選手拒絕回國說起

潘 光 日

趙 超 構

專 論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掛號一元八角，平寄一元六角
六個月：掛號三元八角，平寄三元六角
一年：掛號七元八角，平寄七元六角

香港：掛號八元五角，平寄八元
澳門：掛號八元五角，平寄八元
國外：半年十二元，全年二十二元
郵資：張價酌扣，美金二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第四卷上冊 有售
第四卷下冊 有售

廣告刊例
封面每行一元，內面每行五角
全版一百五十元，半版八十元
一月四十五元，三月一百元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分
掛退：附郵一角
航退：附郵一角五分
如欲退稿，務請註明定單
事後函詢，不易查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臨，請認明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否則無從查覆



警察與法律

編者先生：最近有兩件事情牽涉到法治問題，事情雖小，涵義甚大。

第一件是南京人報載某總司令的公子駕車擦破警察崗亭。警察向前警告他說：「如此開車是危險的，壓死人怎麼辦？」總司令公子回答：「就壓死你也不算回事。」結果警察不知其為誰人，將總司令、夫人、公子、汽車，一併帶局，但結果反到受了警察的處分。而且廳長黃珍吾親自道歉，總司令方纔離所回家。消息發表後，警廳責備該主管區所長查明何以洩漏的原因，該所長坐在人報館非要知道來源不可。黃珍吾且在警校紀念週希望警員執行職務要分辦對方身份，這件事如果真是如報上所說那樣一般無二，實在是有辱警察使命，違反法治的精神，助長惡勢力的威風。第一，駕車不慎，就該處分，擦破崗亭就該賠償，無執照駕車，不免有草菅人命之嫌。總司令的公子與平民應同受法律的管制，不能因身份而扭曲法律。警察是代表國家執行法紀，維持社會公共的秩序。該公子竟然認為壓死崗警亦無所謂，如此藐視執行國家秩序的代表，實屬目無法紀。總司令既然在場，理應管束他的兒子，遵守法律。另一方面說，警員如果出言不遜，自應受出言不遜的責罰，但絕不能因警員的應對不當，而抹殺其公子駕車不慎的錯誤。黃廳長出面道歉，也許是替警員言語冒犯總司令而道歉，但對他主管職責所在的違警事件，亦應堅決處理，何以竟毫無下文？而且還要嚴守秘密！如此下去，一個國家的警察制度，如何能夠健全？照這樣做法，人民之間分了高下，特殊

階級可以違警而無所謂，人民如何能夠心悅誠服？所以事情雖小，影響實大。我們的監察機構，對於這種事件，正應查他一個水落石出。如果是報導錯誤，亦應讓人民知道，以免誤會。如果這報導正確，更應追究各人應負的責任，分別依法治理。

第二件是報載漢口的風化事件。報上說當警察行抵該樓時，外籍人士執鎗拒絕現場拍照，警察人數過少，即未拍照。如果真是這樣，又是一件有辱警察使命，有辱國體的大事。持鎗拒捕，根本犯法，警員就該勒令繳械才對，何能因人寬不敵，就此算了？警察為了維護治安執行法律付予的責任，應存國家至上，責任至上的決心。而這種持鎗威脅警士的人，無論古今中外，均是格殺勿論的。漢口警察竟輕輕放過，其中一部份原因據說是若干太太跪求的結果。這種罪犯乃屬刑事範圍，警察是無權放過，而必須予以逮捕的。而且推事可以提起公訴，目下中國已無治外法權存在，外國公民在中國應受我國法律制裁。革了幾十年的命，好容易取消了不平等條約，而輕輕地就被警察送還了，未免有些荒謬。這事的影響也很大，牽涉到警政與治外的權益問題，損了國家的體面與主權，如何能輕輕放過？一般人似都注視着外僑的驕橫，忽略了自己執法者的懦弱，而不加予責備，也許是怕萬一引起外交問題，又要受上峯的處分；也許是國際知識不夠，看見洋大人先短了半截。總而言之警察當局到場時的處置是有損警察職責的。

丁芸 八月廿二日 南京

秋風！

編者先生：在這秋風送爽的日子裏，北平，這坐「文化」古城，又發生了空前未有的逮捕「匪諜學生」的事件，一次兩次，黑名單，接二連三的包圍、傳訊、拘押和通緝，把一座像靜水似的古城，攪得波瀾

萬丈，人人自危，政府好像是要和整個的青年們為敵似的，不惜任何手段加以迫害，大有非斬盡殺絕不休之勢。而外面所得到的消息，又都是清一色官方報導，要從重重包圍裏透出一點真實的消息，是很困難的。下面是一封僑僑漏網的信，由清華園寄到北平城內的。這個寫信者是一個機械系的學生，平日很少參加各種活動，對於政治問題也很少興趣，所以他的話我覺得是能代表這些沒有色彩，沒有背景的同學們的情緒的。

為了使社會人士對這次事件有一個正確的看法，我想只有把這封信寄給擁有廣大讀者且敢言的「觀察」。現在抄錄如下，希望先生把他披露出來：

GM 八月二十四日 北平

GM：沒有告別，沒有達到常去你家度週末的計劃，我就回清華園來了。到校時園外軍警很多，再交涉、檢查，才放我進學校。進得園來，好像一切都變了，每個同學都緊張得要死。黑名單是一次一次的公佈，聽說還有「不公佈」的名單，隨時可抓，生命全都失了保障所以同學們人人自危。再加上門禁森嚴、買菜、吃飯，都成了問題。教授家就有好幾天沒能買菜的，清華園成了恐怖世界。

校牆外軍警重重，圍得水洩不通，隨時都可以衝進來逮捕搜查。校門、校牆，一點尊嚴也沒有了！聽者宋說，日本人進清華園時也沒有這麼偉大的場面！錢先生夫婦深夜伴着我們的糾察隊在西院道上巡邏，精神真值得佩服。院牆外就是軍警，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的監視着。這樣壓迫，本來大部份同學這兩個月以來都厭倦活動，不是上圖書館看看書，就是在宿舍裏下下棋，聊聊天，再不就是游水打球。當局却以為是好時機到了，跑來大捕「匪諜」，重新把全部學生激動了起來。現在連平日最中立，對外事不聞不問的同學，也都不得不為維護同學和自己的安全而行動

起來了！許多平日只問書本，想在將來建設的時候做一個小螺絲釘的，也都動了起來；當然，是現實殘酷教訓了他們，在工廠基地還在打仗的時候，螺絲釘是沒用的。

至於那些名單上的人物，有的是學了藥離校他去了的，有的是已經走了的，一般「左傾」份子，早就跑了，剩下來多半是一些理事會的理事們，平日搞福利，是幾個「知名之士」，就讓特務們抄上名單報了賬。其實他們頂多有一點不滿的情緒，若只憑「情緒」定罪，什麼「憲法」真該倒過來寫！現在他們上了名單，無立足地了，不得不拋棄一切，走上梁山。一逼上梁山——這句話，現在意義最深刻！寫到這裏，外面同學嚷着叫集合，說軍警衝進來了，要搜捕，同學們很慌亂！天哪！對無辜青年們這樣迫害，還成什麼國家！不寫了……

DP上

樊弘先生更正

編者先生：手教敬悉，至以為謝。弟異常難過，因為今天發現政府的發鈔總額，在拙文中，有一可笑之錯誤，請依王雲五部長之談話，予以改正。弟云發鈔總額為兩千（誤寫成百）萬億，只用六億點七金元券，即可收回。但據王雲五部長稱，「已發行之法幣及東北流通券，僅需二億金元券，即可全部收回。」（中央社南京二十日電）王氏為部長，當然以他的話為最可靠。事關重要，千乞代為更正，毋任感荷。

弟樊弘啓 八月二十七日

歡迎讀者
直接定閱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则，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名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 趙超構：上海新民報主筆
-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 張東蓀：清華大學教授
- 段迪城：
- 李廣田：清華大學教授
- 沈宗澂：清華大學學生

論政府大捕學生

趙超構

「八一九」是個緊張的日子，在那天，幣制改革了，金圓券代替了法幣；同一天，各大都市開始拘傳「匪諜嫌疑」的學生。從南京、北平開始，跟着中、漢口、杭州、上海各地的特種刑庭也紛紛傳訊學生。到現在為止，南京北平兩地所傳訊的名單業已發表，南京是一百七十九人，北平是二百五十八人；其他各地，只知道上海已傳訊了六十三人，重慶傳訊了三十六人，杭州傳訊了三人，究竟還要傳訊多少人，未見官方正式發表。

這一次「拘」傳學生，選定了金圓券出世的日子開始行動，我以為不是無意的偶合。利用全國人聚精會神於緊張的經濟生活的劇變關頭，拘傳學生，因此得以掩蓋了這個行動的刺激性，在人心的比重上，在新聞的編排上，金圓券的發行和金圓券發行以後的發展已使這些學生的命運受不到人們應有的注意。同時政府當局也會正式表示，「改革幣制」與「肅清匪諜」是揭亂時期安定後方的兩大「必需措置」，既然兩者是不相關的，而幣制改革在目前顯然是順應人心的，因此，也可將逮捕學生的前刺激性轉嫁一部份給金圓券頭上去。正如拾價的「奸商」是一般市民所痛恨的，一方面捉拾價商人，一方面捉傳學生，使人覺得政府決不會是於彼而非於此，一定捉得有些道理的。

不停這個日子選得巧妙，在手續上，這次行動也較為完備。學生所受的，是特種刑庭正式簽發的傳票和拘票，這使得有些為人師者世方對學生不可不自動投案。

為了上述兩點，一般人以至文化界對於這一批被捕學生，似乎不像過去那樣關心，做師長的對這次事件，心裏當然難過，但也覺得無可奈何。除了希望法庭的迅速偵審，公平處理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意見了。

但是，我不認為這只是定案，為國家着想，為青年着想，不能說就沒有其他的看法。

我記得，在交戰中，潛伏間諜是必然的，間諜利用機會掀風作浪，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不贊成當局者將間諜看成如此偉大，以為他們還有單獨操縱青年鼓動學潮的力量。在這次拘傳學生的前幾天，中央社公佈了一個文件，認定每一次的學潮都是「匪諜」領導。這使人馬上發生一個感覺：為什麼這些潛伏的匪諜，在如此不方便的情形中，能發生這樣大的領導作用？一個學校，校內有師長的管教，校外有治安機關的協助，為什麼還領導不起青年來？

事實的情形應當如此的：過去政府施政的失敗是事實，社會上許多不公不正是事實，大多數人民的窮苦不安是事實，青年學生為了現實的刺激，不能安心求學，以至於不滿現狀，要求改革，有所批評，有所表示，也都是事實。

正就等於政黨的行動。與青年學生抱同感，甚至同情青年學生的表示，自然可以說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可是，政治性的表示順水推舟，參加在表面，但是青年學生舉行這個運動自有其純潔的一方面，未見得完全是「異黨」操縱起來的；同時，與青年學生抱同樣態度的，同情及扶日運動的，有他們的師長先輩，有工商文化界無黨派的人士，也有從前的參政員和現任的立法委員等等，這是一種頗為普遍的心理反應，能說青年們是完全受了「異黨」的利用麼？

要清算歷史的公案，必須將學生本身的政治行動和政黨的區別清楚。就任何觀點看，學生批評政治是好現象，國民黨訓政二十年，其目的就在訓練人民能夠參加政治，監督政府，學生有知識，有熱情，如果還不能有政治覺悟，還希望一般人民有政治的興趣麼？假如多數公民都能像現在的青年學生關心政治，勇於批評，豈不是訓政的大成功？豈不是國民對國家的大貢獻？

這精說，並不是空話，歷史可以作證：民國以來的學生運動，在發生的時候固然都給當時的政府以煩擾，事後看來總是功多於過。五四運動是一例，抗戰前夕的學運又是一例。這兩年的學生運動，目前看來不順眼，但安知將來國民黨的革

還沒有人做過，大概就因為這樣一個題目所牽涉到的方面比較多，從事的人必須瞭解政治，熟悉史地，更須有充分的生物學的素養，善於應用選擇的觀念，才能下手。近二三十年來，國人喜歡講民族主義；政治選擇應該延長民族主義中的一個核心部分，却似乎根本沒有被提到，不能不說是一大掛漏。

任何團體生活總有預算，一筆入賬，一筆物賬。例如辦學校，註冊費的入賬，會計、出納、事務費的是物賬。政治也如此。預算的目的也可以相比，起碼都求一個收支平衡，而年去年來，更希望收入要比支出略為大些。物賬管得好不好是另一問題，但其重要性是誰都知道的。入賬則不然。戶口或人口應該有一筆賬，固然大家也知道；但人口有數量與品質兩方面，品質的養成又有教育與遺傳兩重因素，則論者往往僅見其一而未見其二。唯其如此，人口的移徙，如果牽涉到的數量不大，就極容易被忽略過去。即如這次的五個遊泳選手，如果問題發生在不時，而不恰好在世運方才結束之後，不要說五個，就是五十個，怕也不會有人注意及之。

其實不必等期人口論者或選擇論者出來作精密的研究，歷史上攤着的這一筆收支賬目已經足堪研究。即以英國，因為歷來政治情形比較良好，大體上說，它所招徠進去的人要比放逐出去的人為多，不過不能太多，因為三島的面積畢竟有限。但是它吃過虧。十七世紀初年以後，當英國教會和政治發生密切聯繫那一個時代裏，威約所至，曾經逼走過不少的自由分子，而受其實惠，從而立異標新，開基業，又轉而與祖國為難，轉而向祖國宣告革命獨立的，就是今日的美國。其它國家中此種人口分子去就的例子更是不一而足，尤其是在交通比較利便的近代，亞力山大第三時代的帝俄，希特勒全盛時期的德國，殺戮以外，都逼走過不少的人，後者還包括愛恩斯坦一流的碩彥在內，而當時受惠的大部分是美國，小部分是英法等國。中國人若比較安土重遷，自由的說法以前也沒有入曉出，但一種自在發展的企業，一種安居樂業，多少想支配環境而不太受環境支配的願望，也始終有它的力量，教一部分人口，轉輾移徙，去此就彼，甚至於轉移到中國政治威力所不能到達的海外。詩經詠碩鼠，孟子美太王，相來當時都有相當的事實依據，決不是一派清談或憤憤往古的空言。降至後代，數量最大而流澤至今未替的一個實例便是五季之世，吳越一貫的保境安民政策所引起的一番向心的口口移徙。太湖、錢塘江、新安江、流域的所以成爲一個人才與文物的中心，其基礎的大部分便是在這時候奠定的。它如南唐、閩、蜀，在同時期內，也曾從別處吸引得一些優秀的人口過去，但只靠一兩個比較開明的政治領袖，而沒有一個長期的保安政策，其招徠成效究屬不大，並且也不易維持。

普通的口口移徙，我們這裏不談。它所引起的往往只是一些因數量上的變動而發生的經濟問題，例如勞力缺乏或勞工過剩以及分配的重新調整等，這些雖也有它們的重要，不在本文的範圍以內。上文一再說到品質，說到選擇，說到人才。我們不妨再問一下，何以見得某一種的移民，初不論人數的多寡，是

品質較好的呢，是經過選擇的呢，是不妨稱爲人才的呢？或者換一種問法，在甚麼一些條件之下發生的口口移徙所引起問題才不止是數量的，而也是品質的呢？五個選手，既然是選手，問題比較簡單，我們無須多事推敲，上文已經說過。但其它的例子未必如此。他們的品質如何，我們只有推論的一法。推論又有兩途。一是事後由他們以至於他們的子孫在新環境裏所作的貢獻來推論，而這是需要相當長的時期的，我們姑且不談。二是由事先的條件來推論。這我以爲可以有三個。

一是他們的移徙必須是自動的，是自己抉擇的，即使其間不能完全沒有外力的影響，有如天災人禍，但決不能完全由於強制。捨棄舊環境，參加新環境，不是輕易的事，這其間需要眼光，意志，毅力，吃苦耐勞的精神，隨機應變的能力；這些雖屬盡人而有，分量往往大有不齊，大抵自動者的分量必比較多，所以易於自然流露，而被動者則比較少，若無外緣的強制，可能便苟安一世，始終不在行爲上表現出來。

第二個條件和第一個條件爲表裏，就是政治環境必須充分承認遷徙與居住的自由。沒有了這個，一個人，無論自動的志力多麼大，最多也只能以逃亡私代遷徙，以窩藏替代居住了。我們從上文的討論裏可以看到，遷徙與居住自由的一大原則則涉之多，意義之大，要在我們平時的瞭解之上，即，在一般的自由與便利之外，更牽連到個性發展上民族優生的問題。除非一個人真有如上文所度其到特性，流浪慾，以流浪爲生活，爲遷徙而遷徙，否則他的目的總離不了開基拓業，長養子孫。

第三個條件也是屬於環境的，而一半也牽涉到政治，其它一半則爲文化的。就是，亂一之中，我們要維持一些分化，大同之中，我們要培植一些小異。一種逐漸擴大的一統與大同之局，最後，到天下一家而歸，是誰都企求的。但我們並不希望國家與地域的分別完全取消，文化與制度的格向通體一樣。我們且認爲在不妨礙和平相處的原則之下，地方色彩應當儘量的保留與培養，惟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提高羣居生活的興趣，保障分工合作的機能，轉而充實一統與大同的意義。而說到我們的題目，遷徙與居住自由的原則也才不至於無的放矢。在一切雷同，凡百一致的局面之內，根本就用不着遷徙，不見異，即不思遷，連有流浪慾的人怕也不免攤換下來，還談甚麼自由不自由。

從五個選手拒絕返國的例子看來，這三個條件之中，目下最成問題的是第二個。國際間的移民一向是不很自由的；種族與宗教的阻礙最古老，其次是國族，是很近代的一個，其阻力不在種族與宗教之下，到了當代，我們又添了一個，就是政治意識。所謂「鐵幕」後的國家，「鐵幕」所要隔絕的，顯然不止是消息的內外傳遞，而是人口的自由出入。這條件一不成問題，其餘的兩個也就發生困難。遷徙既不可能，一個人自動的能力雖大，也就無從施展。五人者得，以離開本國，和我選取自由一書的作者克拉佛真周的得以選取自由一樣，都仰仗一些特殊的緣會，普通情形之下是很不可能的。目下流行的各派政治

意識固然全都希望世界大同一統；有的派別目前雖不容許人民自由遷徙，為的是怕意識未臻固定之羣，初則見異思遷，終則愈遷愈異，從而阻礙大同一統的來臨，但一旦真正大同統一之後，這自由是必然要恢復的。不過，到那時候，問題是，上文已經說過，我們還會有遷徙的刺激與需要麼？大同既同到了意識，統一既一到了思想，普天之下，不再有喬木與幽谷之分，地方色彩，可能只限於吃酸吃辣一類口味之事，我們遷徙做甚？

總之，我們爲了五個世運選手拒絕歸國一事嘮叨了這半天，用意所在，無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中)

張東蓀

§四·我在上文已說過了，中國的統治階級是由一種有遊離性的人們組成的。這些人多少有流氓的性質。讀者千萬不要以爲流氓是只限於無產者。中國的富人亦有流氓性的。所以假定我們不把流氓當作一個惡意的名辭，而取中立的意義，則可說中國有兩種流氓，即一種無產流氓，另一種有產流氓。中國的統治階級雖則內部可以起很大的變化，分爲相反的兩組，而仍不外乎這一類的人。統治階級總是以集團的形式來出現。在朝的是既得政權的集團，而每當其末季却另有一個想取而代之的集團。每一個集團內有文有武，有貧有富，即有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正如像戲班一樣，其中各種角色俱全。其中貧的固然是爲了打自己的出路，但富的人亦只是散去已有的財，另想發更大的財。所以我們必須明白：統治階級的成立固然是由於人類組織上必須有統治關係。換言之，即必須要有政治。好像無政治，人即不能生活。其實這只是一套理論。實際上並不是那樣一回事。這些人們起來把自己造成統治者却大部分在於謀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並不是專爲了被治者而來治。乃反是爲了治者而始有政治。在這裏治者與被治者之分並不是政治性，而反是屬於經濟性。因此統治集團的心目所想的只有兩件事。即如何維持所搶得的政權與未搶得的時候如何去搶。只有在維持其既得政權的打算下，可能多多少少對於被治的人的利益有所顧慮。但決不是爲老百如着想，乃依然只是替自己打算。所以中國歷史上統治關係的建立是以經濟上的封建式剝削爲其基礎。封建式的剝削是由於勢力，而與資本主義下的剝削不同，因爲後者是以資本而取得利潤。在個人主義未被解放出來以前，資本主義的剝削是不會有的。所有的只是這種以勢力欺人壓人的剝削。統治階級的人們即建立其生活基礎於這樣的剝削之上。他們的奮鬥完全是爲了取得這樣的生活。此處所說雖是關於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的情形，然在目前却有一個活榜樣，就是今天國民黨的政權。

我們明白了中國歷史上的統治階級是爲了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的，則我們便可知統治階級的人物是如何神成的了。誠如最近一個論者所說，他們是退無可守，進必以戰。所以在既得政權的統治集團總是處心積慮於如何維持其執政

非要做事實際政治工作的朋友們瞭解兩點。從小處說，他們應知人口的去留直接間接總是他們政績的一個結果，一些表示，他們是有責任的。四郊多壘，猶不免爲卿大夫之辱，何況治下的善良百姓一個一個的溜了呢？二是從大處說，優良人口的流亡與來歸更是民族興衰，文化進退，地方榮替之所繫，今日的毫釐，可能是兩三代以後的千里；能存心及此，前途私極的成就雖不可必，至少他們可以避免爲鯀鰲魚。

的地位，因爲如果一旦失去了其地位，則其生活便無着了。他們爲了政治生命來掙扎，其實乃是爲了經濟利益來掙扎。這種掙扎有死我活的性質，決不能像英美民主國家的兩黨輪替秉政一樣就是爲此。兩黨輪替或合作只是見於憲政軌道敷設以後，而憲政軌道的成立却與個人主義的文化與工業化的社會有密切關係。在個人主義未被解放出來以前，在工業化未有端倪以前，只有個人的升沈與進退，決不會有政治集團的交替。因爲把勢力作爲一元的決定性，將政治與經濟打成一片，這正是封建社會的特徵。資本主義是一元的，在經濟上縱力是資本，在政治上運用力是權力，縱使二者可以互有影響。然而總有封建社會的一元性有些不同。在一個統治集團內，時間一長，自會有內部人事的新陳代謝，個人的升沈進退當然不成問題。這些不是我所要討論的；我今只強調一點：即在這種封建社會，人們的幹政治主要的還只是求生活。所以俗語有升官發財的話，乃是實情。須知他們不能只限於解決生活在官職的任期內，尤必預謀將來卸官後的生活基礎。兼以中國傳統的辦法，統治者爲了容易駕御其部下計，不要有固定的官俸制度。所以在封建社會專制政治，貪污是其中含的必然性。在此只有程度上大小的區別而已。然而終必愈趨愈甚。一個統治集團最後會被人家革了命，亦就是由此而出。

§五·我在上文說，中國歷史上所有革命都未能把生產力的捆束解放開來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封功臣；另一個是殺功臣。封功臣是酬庸，因爲大家一齊來打天下搶政權，一旦得到了當然要大家分肥。國民對於北伐成功以後，下令以勳員儘先作官，便是這和歷史上傳下來的作風。所以當打天下搶政權的時候總是滿口的弔民伐罪，迨其成功，却爲了這些革命同人的出路，不能不再轉過頭來向老百姓壓，不然這些人的生活成了大問題。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換朝代都有這樣的一個嚴重問題。古人早已說過，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這就是說，得天下要靠着一批有流氓性，造反性的人，而治天下却又另需要一批人。果爾則對於前一批人如何安置呢？爲了安置這一批人，使他們得到滿

意的報酬，那只有犧牲本來無抵抗力的老百姓。不但弔民伐罪終成爲百分之二一分兌現，而即經濟結構亦永遠不會更開拓一步。於是換朝代力成爲週期性的了。中國歷史上「君」與「臣」及「民」是三個絕不相同的階級。民是純粹的被治者，幾乎就是奴隸。臣並不是完全被壓迫者，雖則有時亦爲君主的奴役。有時臣能危及君，所以君不能不對這些人顧忌，尤其是換朝代的前夜。我說這一番話雖則是評中國的歷史，但我相信這個歷史的餘毒或病根迄今並未去得乾淨。實在正是我們當前的一個問題。要而言之，當一個既得政權的統治集團腐敗得萬分的時候，這個統治集團即變爲革命的對象，因爲它把生產力再發展的安插阻礙了，但是以革命以後，這些新興的職業性的革命人物亦會變爲阻礙生產力再發展的東西。所以問題就在於此。

不過中國自辛亥以後，外國的一套把戲進來了，憲法啊，選舉啊，政黨啊，這些東西出現於表面，原有的皇帝、宰相等等作廢了。表面上換了一套衣服，而實質卻並沒有真正澈底改變。至少亦得說是一套新制度嵌在舊的歷史餘殘上。在這樣的形勢下更加所謂「失調」(Maladjustment)。歷史的餘殘勢力把新制度沖到完全走了樣了。成了一個雜七雜八的東西。我們先就政黨一點而言，不論是民國九年的政黨方式，抑或是民國七年以後的政黨方式，黨目總是爲了生活才來入黨。姑舉一小事作反面的說明。例如一個教員，苟其他自己對於本行工作不十分把柄，不怕失業，同時亦不想升爲校長，則他決不入黨。可見入黨的人總是以爲沒有社會職能上的地位，或即有而十分不可靠，於是乃藉黨打出路。所以「結」不是黨政治，不是替老百姓做事，乃只是爲了自己。根據這個原理，中國世界上人們的言行不一致力是先入註定的。換言之，即根本上言行是不會一致的。但言行到完全無絲毫的一致以後，所以維繫社會之運將盡墮失，其結果只有訴諸武力。這乃是演發到後來所必至之境界。而革命的要求便在這裏潛滋生了。週期性的換朝代之革命即從此成立。

六、既然有這樣的一個問題放在我們面前，則著者所以要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解除生產力束縛的破壞工作必須嚴格恪守其限度。其先必須有一個社會診斷。而更根本得指出病在何處，即真正被桎梏的地方在何處。然後開刀，恰如其重，不多不少。即破除只可限於那個被桎梏的地方，千萬不可太過。如果事前沒有詳細精密的診斷，而專憑碰碰去看嘗試一下，結果不但會碰釘子，並且一個社會、民族的事，是和一個人不同，一次失敗再來嘗試便須又隔數十年。

「紅帽子」在美國

——記「非美行動調查委員會」

(美國通訊)

段連城

我所以特別提出這個分際問題的緣故，就是有見於專依靠這種由歷史上情性所成的遊離分子爲革命動力決不會摸得出這樣的分際。老實說，在這種傳統的辦法情形下，這一批人是決不會做到恰合分際，因爲合乎分際而不太過，乃是與他們的利益相違反。他們的主要目的還是自己在經濟上生活方面求出路。而真正爲了解除生產力的桎梏却有時只須要去掉那一些障礙爲止。障礙有時亦可能不太多。所以僅僅如此做是不能對於他們的問題有所裨助的。這裏便有一個問題，乃是歷史上所有的革命皆會遭遇到一種矛盾，即從革命的動力上說，必須訴諸感情的衝動。類乎發狂那樣。即從指導革命來說，却又必須倚靠冷靜的理智。辨別分際是理智的事。掀起大波瀾則非有感情不可。二者實難得有一個恰好的契合。平心論之，革命本是理智的事。無如專業理智，不能把革命煽起。故煽起，命要訴諸感情，但感情一起則不易控制。這是一件最艱難的工作，不可以輕浮的態度對付之。所以歷史上的革命幾乎無一不是犧牲太大而代價不足償其十分之一。換言之，則成就太少而浪費太多。法國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其成就對於人類實在抵不上。俄國大革命死的人數更可吃驚。當時如以現在的局勢爲藍圖從事製造，恐怕這些死亡都是不必要的。即不死這們多人亦可達到今日這樣的目的。

原來人類的慾望，就普通人而言，有三種，比較上最爲基本的。三種是男女之慾、物質享受之慾、與權力支配之慾。在社會騷亂的時候，這些慾望都會有顯現。例如在俄國革命的當時，所謂「一杯水」是僅有其事，後來不久即經列寧的大聲急呼的反對而始絕迹了。本書不談這一點，故不往下再說。所以說只限於物質慾與權力慾。這兩個慾望的消長是資本主義的放任經濟與非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有關。在放任經濟下，人們偏於向物質慾方面去發洩。即獨佔性企業的大資本家往往要操縱政府亦依然是想更得較多的利益。一旦改爲統制，則人們的物質慾總會受到限制。於是其慾望的發洩便自然偏向到權力方面去了。往往在政府不加其權力的需要時，即在大權政府時，政府內部極容易爲權力之爭起衝突，生磨擦。這就是物質慾之限制時有時反使權力慾增高。換言之，即權力消長不是正比例的。雖往往在初期還能有外發展，不致於內部自起權力之爭，迨到後來擴張到了相當程度或停止了，却不免要有種種問題引起衝突。這一點似乎爲謀國者所應注意。

根據上述的種種，我們在歷史先例上可以取得下列的教訓：凡是一個革命，總包含兩個階段，一是破壞舊的，二是建立新的；但在破壞舊的之中却往往即孕育有對於建立新的之障礙。換言之，即問題可能已不在如何推翻舊的，而在於如何克服孕育在新的之中的自己所造成的內部困難。

四個月前某天，華盛頓星報的主筆召見一個採訪醫院的記者，問他是否相信共產主義。這個年輕人，相信自己

開除他。事後，華盛頓記者公會發表聲明，認爲相信共產主義，是一個「公正而充分」的開除理由，因爲那種人已

經「不再有任何價值」。在美國，沾着一點紅顏色的，就是生長在一個「信仰自由」的國家裏，遂直說是。主筆先生很誠懇地告訴他，說報館對他的工作非常滿意，但是

是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

因此，在政治鬥爭中，「紅帽子」遂成爲一個很厲害的武器。進步黨領袖華萊士，如今已讓政客們及「輿論界」塗得遍體皆紅；故總統羅斯福，被人罵做「共產黨」，也是屢見不鮮；就是杜魯門先生，在南方「白人優越」論者的口中，也是「該共黨一壘着鼻子走」。在一片「狼狽」聲中，最是有聲有色的，莫過衆議院的「非美行動調查委員會」了（後文簡稱非美會）。與該會並肩工作的，是參議院一個行政費用審查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前者主席是潘奈·杜馬氏（J. Parnell Thomas），後者主席是荷馬·佛格生（Homer Ferguson）實地執行調查的，是美國特務機構「聯邦調查局」。

公審女間諜

最近杜魯門總統開特別國會，這兩個委員會，遂也開始工作。一時「紅帽」亂飛，牽涉到任重要政府官員，消息震驚全國。首先，是報紙傳說，謂有一個金髮的妙齡美女，曾任蘇聯間諜，現在自首招供，揭發共產黨情報網。七月三十日，伊莉莎白·貝特麗（Elizabeth Bentley）小姐出庭了。褐髮、肥胖，雖然她曾經拒絕回今年齡，顯然是四十來歲了。旁聽席上，坐不住一區失望的政敵騷動。她沒有具體講出任何驚心動魄的間諜故事，供辭中却牽涉了二十個政府官員，說他們直接間接提供給她政治及軍事情報。她的職務，是一個小組聯絡員。在這三十人中，有前區區軍部副官長懷特（Harry White），及羅斯福親信顧問居里（Lauchlin Currie）。居里戰時曾兩度率領代表團到中國，在「時代」週刊刊出他的「一張照片，背後說着蘇聯問題」的照片。居里的供詞說他從來沒有認識過一個共產黨人；懷特則氣得直呼「荒誕」。這位自首間諜員小姐，似乎拿不出具體的證明。

其次要緊的，是商務部要員明登（William Reimbold）。當原任戰時生力軍。貝特麗在戰時常與他會面於公園或街角，拿到許多有關飛機生產的資料，並探悉美國在造原子彈，以及發射空中堡壘。雷之供詞，則謂貝以新聞記者及研究工作者之資格出現，收集資料，他並沒有給她任何不可爲其他記者知道的消息。他之所以間或與貝小姐會晤於街角或公園者，無非「年輕浪漫」而已。貝小姐竟也無辭反駁。

於是，非美會不得不推出另一張王牌。這個「改過自新」的共產黨，是原任共黨機關報紐約「每日工人報」總編輯的白登（Louis Budenz）。他出庭作證，謂蘇聯第

五縱隊任職美國政府者，數可以千計。他說他無法具體證明貝小姐的供詞，因爲雖然他自己也參加過地下工作，但是共產黨的情報，機密到「左手不知右手在做什麼事」。不過，他充分相信貝的話是真的。次日，庭上又出現了另一個「悔過」的共產間諜，他是「時代」週刊的高級編輯張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他叫出的一串共黨地下工作者的名字，更是驚人。

第一個，是前國務院要員赫士（Alder Hiss），在舊金山會議時，担任過美國代表團秘書長，并會陪伴羅斯福參加馬爾他、雅爾達等重要會議。據張伯斯稱，赫士在戰前就担任一個共黨情報小組的首腦，主要工作，是幫助共黨人員「滲透」入各政府機構，以便收集情報，供給蘇聯。張氏當時，屬於赫士小組。當一九三七年彼脫離共黨時，曾力勸赫士自新，赫士甚爲動搖，痛哭流涕，但結果還是不肯回頭。這一段故事，講得繪聲繪色。兩天以後，赫士自動出庭作證，宣稱以後，却說他根本不認識張伯斯其人。張伯斯也當庭宣誓，硬說他認識赫士，只可惜也拿不出任何確切證明而已。

在這幾乎是翻臉投窮的時候，非美會負責人又大放空氣，說找到一個「神祕」證人，可使全部間諜案水落石出。兩三天來，多方渲染，只是不見其人。據公報此刻的廣播新聞，這「神祕」證人，也並非真另一個「自新」的共產黨員，由華盛頓傳到紐約。他即供出定，大紅也其供詞頂一「紅帽子」而已。非美會諸公，反正「獵紅」任務已過，也不管斤斤計較證據，何名，真像如何了。非美會的十年歷史，危言聳聽，報紙製造大標題，本是其一貫作風。

大破好萊塢

委員會創設於一九三八年，由馬丁·戴氏（Martin Dies）主持。初定是調查納粹及共產黨對美的反叛行動。馬丁是一個好神手，他以宣稱當年好萊塢童星秀蘭鄧波兒有共黨嫌疑而名聲遠播。馬丁死，杜馬氏繼位，肯出於虛，每年都有大砲。一九四一，他說美國軍中處處是間諜；一九四二，他說政府官員，都服用「不務正業」的女孩子「做秘密」；一九四六，他說田納西州的原子彈工廠，操縱在「國以外」的人手中。每次他都大呼調查，說得驚人驚聞，但照例既無證據，也無下文。若非美會的一大串絕作中，最精彩的，當推去年十月的「大破好萊塢」了。

杜馬先生，一聲吆喝，說共產黨控制了美國電影事業，在替蘇聯作宣傳。當時間傳來了大批好萊塢名星。在衆議院會議室中，只能容納三百人的旁聽席，擠得水泄不通。

在場有一百二十個記者，三十個廣播員，六個新聞電影攝影機，及一架無線電傳真攝影機。在強烈的水銀燈及攝影鎂光下，不少人帶起了黑太陽鏡。因爲牽涉的多是男名星，旁聽席上遂多是女人。當演一塊斷藍橋」的小生維勃泰勒發言時，旁聽席上歡呼與掌聲不停，杜馬氏敲動了一隻維持秩序的木鐸。三個禮拜的審查，熱鬧非凡，震動全國。但杜馬氏並沒有找出什麼共產黨控制好萊塢的有力證據。審查終結之前，他雖大吹大擂，謂將公佈一批好萊塢出品，替共產黨作宣傳的影片，結果毫無下文。

「獵紅騎士」杜馬氏

「非美行動」，鬧得如此滿城風雨，然則究竟何謂「非美」？美國法律，並無註釋。答案恐怕只好由杜馬先生處找尋，因爲照理他應該是最正牌的「美國主義」（Americanism）者了。他曾經說：「美國主義，就是保守主義。一切激進份子，都是「非美」。因此除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者外，他更把「新政者」也放入「非美」項下；同時更發明了「同路人」（Yellow Raylers）及「淺紅派」（Paror Pink），以包羅所有不保守的政治組織。

正統「美國主義」者的杜馬氏，是一個死硬派的共和黨徒。寒風並非空門，但早年在「華爾街」混到一碗飯吃，遂培養出對老「們的忠實。他最近得意之中，告訴一個記者，說他在學校「從來不是一個好學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校裏有一個「戰與講義」，中途有幾個左翼學生反對。「你知道我怎麼辦？」杜馬氏驕傲地說：「我邀集一批人，把那些傢伙伏擊髮剃光，丟在一個全是癩蝦蟆的池子裏」。他頓了一頓說：「我在一哩路外，就可以嗅到一個共產黨徒的味道」。

最近杜魯門提出了保障黑人的「人權法案」，南方主張「白人優越」的「三K會」（Ku Klux Klan），大肆活躍。幾百門社相架，穿起白袍，披着白面紗，舉高燃燒着的十字架，發表宣言說：「要是人種法案通過，街上請看血流成河」。這個會不但在提倡種族優越論，而且在組織及行動上，都與納粹黨有密切聯繫。他們反對黑人、猶太人、羅馬正教徒以及一切來自南歐的美國人，至於共員主義，更不用說了。在非美調查會中，也有個「法西斯調查組」，最近作了一個報告，說三K會是一地道的美國組織，當然不是一非美！

維持「民主」牌招

當非美會在大丟「紅帽子」的時候，美國共產黨最近

却在紐約公開舉行全黨代表大會，制定政綱政策，宣佈支持華萊士的進步黨。這個似乎矛盾的現象，顯示出美國政客們硬要維持「民主」招牌的苦衷。他們既仇視一切進步的份子，但同時又覺得在這樣一個號稱信仰自由的國家裏，不能遽稱某種主義或學說不合法。所以美國共產黨，理論上說，現在依舊是一個合法的政黨。不過美國一般人民，對共產一字，多有一種幾乎是本能的疑忌與敵視，政客們遂針對這一點，盡力在每個共產黨員或左翼份子，以至於一切改革派頭上，加一項「紅帽子」，使他們在社會中困難甚至於無法生存。在這一點上，非美會有過很重要的貢獻。

在美國的選舉中，每個人投票時，至親如夫婦，也得站在三尺以外。因為憲法曾聲明定秘密投票，以使人人可以不受環境影響，自由選擇他的政治信仰。既如此，非美會在大庭廣眾中，全國新聞界前，聲請個人的政治意見，是否合法，本極明顯。所以過去許多以何高的人，對非美會「你會否做過共產黨」的問題，都依法拒不同答。結果却被加以「蔑視國會」罪，送交司法機關懲處。今年五月，非美會的兩員健將孟德（Karl Mundt）及倪生（Richard Nixon）曾提出一個反共法案，要求所有其行政機構及「外圍組織」的負責人與會員公佈登記。這個公

法化「紅帽子」的法律，雖經眾院通過，終因與「民主」招牌紙糊太甚，而在參院擱淺。

杜魯門與「紅魚」

七月二十七日，杜魯門召開特別國會，討論物價及房租。這消息一直是報紙的大標題。五天以後，非美會開會，搶去了華盛頓消息的一大半。兩天內，非美會竟變成頭號大問題了。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杜魯門憤忿地說：「反美會的調查，無非是一條紅魚，來分散公眾對物價與房荒的注意。」這話指出了非美會的另一政治目的。在這大選的前夕，杜魯門預備了大批新色彩很濃厚的提議，交給國會討論，要想討好低層大眾。共和黨製造的這條「紅魚」，不但搶去了他的生心，同時暴露了民主黨的政府，如何讓共產份子與蘇聯間諜「滲透」；美國的一安全，如何在受威脅。

此外，非美會之選定這時候上領新職，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打擊華萊士的進步黨。在這一次和牽涉上的前任政府官員中，有好幾個是華萊士新黨中的要角，更有很多是前商務部內華氏的舊部。因此竟有人要調查查華萊士。本來，在今天的美國，並沒有多少真正的共產黨（美共黨員數目，據該黨最近全會宣稱，也只有六萬人）。況且其

產黨在美國社會中，也難起大作用。最近，十二個共產領袖，已因「圖謀暴力推翻美國政府」而被拘到候審。所以「華爾街」真正的隱憂，是一切反共的自由主義者；而非美會的目的，也即是拿着「紅帽子」的法寶，使他們嚇著。

至於一般的美國老百姓呢？在戰後繁榮的今天，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歡喜熱鬧是他們的天性。報紙上，廣播裏，聽說電影明星是共產黨，大官也是蘇聯間諜，倒也聚攏刺激。究竟這些事是什麼意義呢？他們很少功夫去想。去年底，當政府開始公務員「忠實調查」（Loyalty Check）的時候，一個南方的女人，因為「Check」另有一個通義是「支票」，遂以為政府在發「忠實支票」。趕快寫封信給政府，說她戰時從軍，任婦女輔助隊員，服務熱心，請勿忘「Give me a loyalty check」。當聯邦調查局的人來找她時，她大呼：「擁護民主，我不知什麼是共產主義，我以為是錢！」

人人都擁護「民主」，究竟美國的一民主是什麼？替紐約時報撰文的一個作家，曾前去訪問非美會主席杜馬氏。問他什麼是共產主義，他說：「一無階級獨裁，奴役人民，一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他說：「我想差不多」；什麼是民主？他想了一想說：「民主」？反正每個人都知道一。誠然，反正每個人都知道一。（八月七日寫）

文明在生死之間

Civilisation on Trial The Listener July 15 1948

Arnold Toynbee

現代西洋文明正在考驗，這也是一個新的觀念，也是一個新的觀念。「文明」一詞對我們大多數人看來正是指和那些曾考驗的互相相反的對象。大戰之前——至少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我們常以為文明是美如黃金，安如磐石的。我們祇索們可能曾歷盡艱辛，我們的文明，但是我們却覺得並無災災這家珍寶物的危險。

我想，對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世界不發生懷疑是很自然的。和我年齡相若的一輩英國人，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長大的，對於現代西洋文明確是認為不必懷疑的。我們在那時沒有文明會考驗的想法——我們那時並不懷疑這種文明而發現它的缺點。就是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這個文明已在被考驗的觀念在很多人還是會覺得驚異的。無論如何，我們的文明可能遭遇災難的警覺現在似乎已經在覺醒了。我去年春天曾在美國住了三個月，在那裏我發覺這個問

題已進入了人民的心頭，這對於一個歐洲來的旅客當然是個很深刻的印象。在我們看來，英國人現在正站在權力、財富、和繁榮的峰尖。但是美國的中產階級却可能比我們更為不安和恐懼，雖則我們英國人居住的地方才是大西洋更不安全的一面。

美國人比我們更為志忑不安是因為他們的失望比我們更大。美國人渡海遷移到新大陸，原是想和歷史割斷，而現在歷史却追蹤了他們，而且已經趕上了他們。歷史不開玩笑的，因為在它的秘密裏陳列着骷髏——不祇是一付，可能已有二十付。它們是文明的骷髏，在過去遭受了災難的遺體。當我們對自己的文明的前途不覺得有錯失時，這些尸首不會使我們不安；現在它們確已引起了我們凜然之惑，我們的自信已受可怕的禍患，驚人的罪過和冷酷的殘忍所打擊，這些就在我們這一代，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眼

前發生。我們曾見過此可怕的經驗究竟是什麼意思。它們是否指出我們自己的文明和那些骷髏裏的那些骷髏同其歸宿。

我們想得到的那最初最衰的文明是希臘和羅馬。它的衰亡和崩潰和我們特別親切，因為我們自己的文明就在它的廢墟上長成的。羅馬帝國的興亡陳跡，我們會重演這一套麼？羅馬帝國滅亡時曾遭遇些什麼？如果我們回頭看看羅馬帝國的滅亡，和希臘羅馬文明的解體，可以見到幾條線索：物質上生活程度的跌落，這一點我們現在已經感受到了；理性主義的降低——退回到愚昧和迷信，行為標準的下降，法律和秩序的式微——退回到野蠻程度。

就那些必須承受些痛苦經驗的人說，我想，物質上生活程度的跌落是最容易應付。在羅馬的末期，財產成了負擔——並不是他們不喜歡享受，好逸惡勞原是人性之常，

而是因為代價太高。財產所有者在羅馬末期所付的代價是他日常生活各項細節所受到的管制。我們這一代和這世界在這方面也已經有相當的經驗，但是羅馬末期的情形比現在却還要嚴重，嚴重到人們寧願受極大犧牲，設法逃避這類管制。注意精神生活的人把財產分給了窮人，遁入空門做和尚或是做隱士；積極性的人逃到遠處的野蠻人裏去自求出路。最後，希臘羅馬文明整個複雜的物質結構崩潰時，大多數的人反而感覺到喘了一口氣。

最可怕的事到並不是物質享受的喪失；生活簡單化了也減少了許多複雜文明裏的煩惱。可怕的不是物質的崩潰而是道德的崩潰：愚昧，迷信，無法，殘忍的勝利，克服了希臘文明在它好的日子所建立下的道德標準。這是一個文明崩潰時可怕的事，我相信，我們現在所畏懼的也就是這道德退化到野蠻程度的危機。我們已受到警告：在西洋的中心地點，就在這一代，我們已遭受德國納粹的道德災禍。如果西洋有一個大國屈服於此，很明顯的西洋的道德標準已經不夠穩固了。德國可以發生的事，誰能保證不發生在其他的方面呢？道德的破壞才是文明陸沈中的真正悲劇。

孤立的事件還是通常的遭遇？

但是我們是否需要擔憂自己所有相似的遭遇呢？這是要看希臘羅馬文明的陸沈是一件孤立的非通常的事呢，還是自然秩序中有所在的。當我們談到古羅馬的崩潰或某家天火的所聞，我們不常因此而自問：自己房屋今夜也會失火，或是明天自己所坐的火車也會出軌，因為我們知道這些是意外。如果這類事情每隔一天就發生在我們的街上或鐵路上發生，我們也不以為然了。所以關於希臘羅馬文明的陸沈這件事我們所要注意的：這件社會的災難是不是歷史上的例外？歷史上也有類似的情形麼？這問題的答覆，我怕，並不是愉快的。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裏去重讀一遍歷史，我們確可以見到不少同樣的例子。

我們首先提及希臘和羅馬，因為我們對於這段歷史是最熟悉的。我已說過，我們自己的文明是從羅馬帝國的廢墟上長成的。希臘羅馬文明同樣的是長成在另一早期文明的廢墟上。這早期文明是 Minoan 文明，它很早就滅亡了，連它繼承者的希臘都不再記得它。但是，在上世紀的末年，有一位英國的考古學家 Sir Arthur Evans 在克利脫島上發掘了出來。我們還不能理解 Minoan 的文字，但是考古學家却重新發現了這個文明。他們告訴我們這個文明和後來的希臘羅馬文明一般也有過一個興亡的故事。這裏不過是兩個早年的例子，我們如果看看世界的其他部分，同樣的例還多着。以遠東說，這是個在最近以前的歷史。中國的古代文明也有它興亡的軌跡。在二世紀的時代他們的大帝國瓦解了，比了羅馬帝國的瓦解早二百年。如果在已死已葬的文明以外再加上那些雖則還活着但已無可否認的在式微中的文明，這類例子我還可以列舉二十個。依我所可以看得到的說，我們不能不承認其已式微了的試有西洋現代文明。

如果這些是事實的話，我們現有的世界是很奇異的。我們好像是站在一間房裏，這房裏躺着一堆屍體，就是那些還沒有死的人也已病得奄奄一息。這能如着和這能如着的人，他明白了這一切體生已所犯的病症，他也有見於此，病人正犯着這些病，而且可能跟着要走上死路了。他必然會以疑亂自己，這惟一的例外。他是否也會這同一迷惘？也許他已經表示了致。以他周圍的社會自己，含着溫度表不時的有自己是不是在發燒。他這了，他出聲不絕在瘟疫裏也可能會死在恐懼裏。這是我所忘記，西洋當今多數人的心理狀態。

我們既已談到這裏，也就不能不在這裏了。我們不能以一個問題來問自己，這就一個生和死的問題！我們必須設法去先這些歷史的例對於目前情形有什麼啓示。我們自己的文明是無救了嗎？我立刻將給你們我個人的答覆。我並不相信任何文明的滅亡是連綿不絕的，我也不相信它們都犯了無可挽救的病症。所以我們不必認定我們是無

救了，低着頭，讓運命的刀在斷頭台上落向我們的頸項。如果我們果真這樣束手無策，我們的頭是該這樣被切斷的。你們可以責問我，你不是告訴了我們二十個文明已經滅亡了麼？現在不是將輪到我們了麼？我們會是惟一的例外麼？不是的，我的答覆並不如此。我可以給你說出兩個理由。第一是二十個例子並不能構成一個原則，第二是人中太多不易預知的因素，隨時可以改變它的前途。我們自覺當前的危機就是一個足以自救的心理因素。假如我們不垂頭喪氣，等待死亡，而奮發起來，這就可以轉換我們的前途了。

喪命於戰爭中的文明

讓我們看看那些滅亡了的文明怎麼會死的，然後看我們是否能避免這種致命的錯誤。我相信它們都是喪命於戰爭的。這些文明的歷史中，都發生過地方政治集團間日形嚴重的戰爭，雖則這些戰爭所致死的文明在最後的一期，能結束戰爭，但是隨着戰爭而起的卻是更深的病症。它們是以取消地方政治集團的方式來結束戰爭的，取消地方政治集團的方式是征服，一個強權把所有的競爭者都擊敗了，推行和平——羅馬帝國在希臘世界所強致和平是一個我們最熟悉的例子，同樣性的和平在同樣的方法中在中國推行過。羅馬式和平的弱點是時間太遲和代價太大。在交戰集團沒有打倒筋疲力盡時，戰爭是有不下的；而且停下來時，社會的損害已經大到不易復元了。因之這種和平不能持久。它不過是延緩一個文明的死期罷了，並不能救它的生命。

我們現代文明所面臨的困難問題是：我們是否將用羅馬的舊方法來結束戰爭？我們能否不從力竭停戰的和平中取消戰爭？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曾不斷尋覓以和平和合作來代替世界以致的戰爭，想用以代替暴力相殺的戰爭。如果我們能有所成就，那就是以以往的各種不致於滅亡的文明所沒有的成就，那也足以為人類歷史的新頁。這是我對於文明陸沈論的答覆。讓我們不要這危險閉上眼睛，面對這危險時也讓我們不要手足無措。我們得在我所談的自救之路上去努力付它。我們並沒有註定了滅亡，而會在我們手上，一切在自己。

最完整的人格

哀念 朱自清先生

佩弦先生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七天了。在這七天之內，時時聽到有人在談論佩弦先生，也看到不少紀念佩弦先生的文字。至於我自己呢，却一直在沉默中，漫說我自己

提筆說話，即使有人向我問起佩弦先生的事，我也幾乎無話可說。我在沉默中充滿了傷痛。假如說話可以解除傷痛，我是應當說話的，然而我的話竟不知從何說起！

李廣田

在別人的談話中，以及在別人的文字中，大都提到佩弦先生是一個最完整的人。我覺得這話很對，但可惜說得太籠統。我願意抑制自己的感情，試論佩弦先生的為人。

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其實，朱先生自己又何嘗不是一樣。關於中國當前的情形，他在「論吃飯」中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行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飽甚至沒飯吃，什末禮義甚麼文化都說不上。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飯也會起來行動了，知道吃了飯權的更怎麼能不起來行動，要求這種『免於匱乏的自由』呢？於是寫出一飢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標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的承認了吃飯第一。只消過朱先生前一期作品的人，或者只看到了朱先生性行學問的某一方面的人，可能不相信這是朱先生的話，然而這確是朱先生說的，而且說得那麼好，那麼切實，那麼勇敢，這自然是時代使然，然而這靠了主觀的力量，主觀的正義感和自覺心，也就是靠了朱先生的至情和對於真理的愛好。至於他對於今天的文學的意見，那就更其明快而顯然。朱先生並不是歷史家，然而近年來所寫的文字中大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論是談語文的，讀文學思潮的，或是談一般文化的，大半是先作一歷史的演說，從簡要的演說中，揭發出歷史的現象，然後就自然地得出結論，指出方向，也就肯定了當前的任務。在一新詩雜誌的第一篇「新詩的進步」中，他承認「從新詩運動的開始，就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一語文空拾一中有「一歷史在戰鬥中，他推崇雜文，說一時代的路向漸漸分明，集體的要素漸漸強大，現實的力量漸漸迫緊，於是雜文便成了春天的第一支曲子。」在一標準與尺度一中有「文學的標準與尺度」一文，說「社會主義是一今天的尺度，『文學』終於要配合上『新詩』的『民主』的尺度的前進的。」又說「一特權階級登台以後才見到『民主』的尺度的前進的。」現在也還有低級趣味，就是沒高度深度來比較的。可是現在漸漸顯出『民主』的尺度的高度，普及同時也是提高，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在「論雅俗共賞」一書中有「兩期神話」一文，他說，「一則神話是羣衆的詩，是使體的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羣衆，他也是羣衆的代言人。……則神話要能表達出大家的憤恨，喜愛，需要，和願望，……則神話直接與實際生活接觸，它是宣傳的工具，戰鬥的武器，而宣傳與戰鬥正是行動與工作，……它活在行動裏，在行動裏完成，在行動裏完成。這也正是神話之所以為新詩中的新詩。這一切，只說明一件事，就是：朱先生說話的立場乃是人民的立場，正如他在「論雅俗共賞」的序裏所說的，而最急切的目的則為新的『民主』文化，新的『民主』文學。為人民，爭民主，這是今天的真理，這也就是朱先生近年來所寫文

字中的主要內容。

第三，佩弦先生是一個很有風趣的人。若說朱先生是有幽默感也未嘗不可，無乃「幽默」兩個字已經極幽默專家們用得辨真面目，所以我很不願意使這兩個字來和朱先生發生連繫。何況，那些幽默專家或幽默大家是為幽默而幽默，而朱先生則不然。他有至情，可並不一天到晚纏綿悱惻，他愛真理，也並不逢人說教，他嚴肅而認真，却絕不板起鐵面孔，叫人不敢親近，只感到苦燥無味。他是有極有風趣的，他的風趣之可愛可貴，正因為他的有至情，愛真理，嚴肅而認真。三十一年我到了昆明，在大街上遇到的第一個熟人就是朱先生，假如不是他老遠地脫帽打招呼，我簡直不敢認他，因為他穿了一件奇奇怪怪的大衣，後來才知道那是趕馬的人所披的毛氈，樣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顏色却像水牛皮。我當時只是想笑，然而不好意思，他却很得意地告訴我一個大消息：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中國的抗戰已成了世界大戰的一環，前途十分樂觀。以後我在街上時時注意，却不見有第二個人是肯於或敢於穿這種怪大衣的。有一次在西南聯大的廣場上開文藝晚會，幾千聽眾都隨便地坐在草地上。朱先生的講題是「五四以來的散文」，他說，「甚麼是散文呢？像諸位這樣地坐法就是散文的坐法了。」他自己不笑，全場上却哄然大笑起來，朱先生每次演講都引起這樣的歡聲。在他的文字中，更是有到這風趣。在「雜文集」中，有一篇「看花」，中間有這樣一段：

「至於『略略』的趣味，那是以後的事：夏天的早晨，我們那地方有鄉下姑娘在各街巷，門前，一賣梳子花來。一梳子花不是一整高品，但我喜歡那白而帶黃的顏色和那肥肥的個兒，正和那些買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韻味。梳子花的香，濃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樂意的。我這樣便愛起花來了。也許有人會問，「你愛的是不是花呢？」這個我自己其實也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論了。」（十九年四月）「也許有人會問，其實沒有誰問，只是作者自己在體會那種情意味了。在『同中』還有「談抽煙」，「揮偶記」等，都是同樣富有風趣的作品。這類文字看起來容易，作起也相當吃力，即如一談抽煙」，據朱先生在自序中說，才八百字却花了兩個下午，所以這風趣的形成也還是出於嚴認真。近年來所寫的文字大都是非常沉重的，不像前一期期的文字那麼輕鬆，然而其中也還是充滿着風趣，譬如「論雅俗共賞」一書中的「論書生的酸氣」，「論老實話」等，都在嚴肅中見出一幽默，——這裏我居然又用了一幽默一兩個字，我的意思是說真正的幽默，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滿含着同情，慈心與正義感的風趣。三十六年二月，他的「新詩雜誌」出版了，這本書的編定在三十三

年十月，書稿交出後便石沉大海，中間一度傳說稿子已經被書店失落了，朱先生常常提到這件事，現出非常傷心的神色，以為這本書再也不會與世人相見了，不料事隔三年有餘，書竟然出版了；他喜出望外，在目錄後的空頁上題道：

「盼望了三年多，擔心了三年多，今天總算見到這本書！辛辛苦苦寫出的這些隨筆，總算沒有丟向東海大洋！真是高興！一天裏翻了足有十來遍，改了一些錯字。我不諱言我『愛不釋手』。『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說是『敝帚自珍』也罷，『紙情情深』也罷，我記了。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晚記。」在這段短短的題字裏一連用了四個驚嘆號，第一行上邊蓋了一個「避江齋」的開印，最後一行下邊蓋了一個「佩弦藏書之鈐」，大概太高興，高興得手忙腳亂，第二個圖章竟然倒置了。

有至情，愛真理，有風趣，這就是朱先生之所以為朱先生，這就是朱先生的人格之所以被稱為最完整的人格之所在，這也就是為甚麼，當朱先生生活着的時候，無處不贏得人的敬愛，而當他的死耗傳出之後，無人不感到傷痛與同情。也許有人要問：至情、真理、風趣三者，何者較重要，何者為次要呢？我不知道這問題有無意義，也不知道這問題怎麼回答，因為朱先生的人必是三者的一體，我們不好把它分開作爲比較。讀他一期散文的人最容易感到他的至情，常和他接近的朋友最容易覺他的風趣，而覺得他平易近人，而近年來，在時代的風暴中，在一面是荒涼與無恥，一面是嚴酷的工作一的對照中，最足以見出朱先生是真理的擁護者。朱先生終在不羈地進步中，他不但趕着時代向前走，他也推着時代向前走，他不但隨同青年向前走，他也領導青年向前走，然而，無可如何，他的體力，他的健康却一天一天地向後退了，他終於退向病牀，退向死亡，現在，朱先生，我們的領導人，我們的同伴，我們可敬愛的先生和朋友，却垂下了一把骨灰！這又豈止是個人的損失，豈止是少數人的損失，豈止是文藝界或學術界的損失而已呢！假如中國真正「勝利」過，假如中國沒有內戰也沒有「動亂」，假如中國已經民主，已經和平，假如朱先生生活得好，生活得如意，他何至於這樣地死去。假如朱先生體力好，假如朱先生能夠得到天壽，朱先生對於新文學、新文化、新社會的貢獻將是無限的，這由他過去的成績可以證明，由他近年的轉變與進步更可以證明。朱先生在過去盡了他的力，在今天也盡了他的力，如果他活到將來，在新的社會中，將更有他的大用。然而，朱先生竟然這樣地死去了！從我去年夏天來到清華大學之後，就看見朱先生的書案玻璃下壓着兩句詩，是朱

紀 錄

三十七年八月廿一日下午四時為警憲在燕京 校內搜查學生事對在場的學生教職員跟警

憲說話

陸志韋

這樣的聚集，在燕大的歷史上還是頭一回。從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點相像的，那是二十二年八月八日上午十點鐘的聚集。所不同的是，那一天來校的是仇敵，是日本人。今天來的是我們的同胞。是同胞，將來共患難的日子多着啊！

八月十九日，本校接到北平高等特種刑事法庭的拘票，要逮捕燕大的學生，一共十七名。還有因為「危害國家」的案子要傳去訊問的，一共有十四名。其中有吳其進一名，是本校畢業生，在引導服務部已經二年了。其餘的三十人之中，有的已經畢業離校，有的早已退學，有的暑假不在校，有的雖然是准許留校的，可是假期之內，住家的流動性相當的大。所有拘票傳單，實在無法送達。私傳的吳其進既然是本校職員，我就通知他趕快回學校來。不料當天下午他就往東校門讓警憲不問情由逮捕了，送北平市警察局第六分局了。那天晚上，本校設法把吳其進從第六局保釋，隨傳隨到。

從十八日晚上起，學校讓軍警包圍了。學生員工都不許出入。食糧斷絕。同時，學校方面兩次檢查宿舍跟校場上其他各處，名單上的三十人之中，並無一人在校。我們就根據事實，報告第六分局跟這一回負責搜查燕大的林團長，他是「百」八師的。直到今天十二點鐘為止，地方當局自然不能完全信任學校的報告，以為非進來搜查不可。他們在職務上，不能不有此一舉。這是大家應當諒解的。實在搜查的官存的，並不是來搜查的人。軍警搜查學校，在民主國家是非常的事件。

下午兩點多鐘的時候，林團長來學校，跟我商量搜查的手續。他態度十分客氣。他說是為執行公事來的。各位，我的處境的困難，就不說，你們也能明瞭。拘票上傳票上的學生，早已不在這裏了。受搜查的全部是跟這事件絕無關係的人，可是學校說話已經不能見信於人。我們沒有力量拒絕搜查。我在學校行政的立場上，並且不能對於非常時期的特種法令表示什麼意見。我當然可以用種種推辭，把這件事拖一些時

候。可是我不願意借外勢，也不願意求人情，打官話。我知道你們不要我幹這樣的事。照我的估計，這搜查的手續，早晚不能避免。我並不怕事，我出死入生，是為中華民族經過患難的。我為你們選擇了對於你們最少損失的一種方式，就是說，開了條件，讓警憲進學校來搜查。我要是做錯了，我個人負責。我對我的同事負責，特別是對西籍的教職員。因為用民主的眼光來看，今天你們會看見看不慣的事情。我做中國人，只有慚愧。召集學生，也由於我個人負責。你們要守紀律，有話事後再說。林團長跟我約定的條件是這樣的：

(一)軍隊不開進學校，棍子的警憲可以進來三四十人(註：來的一共六十九人，我不得不拒絕了二十幾個人，請原諒)。
(二)只查人。不查物件。(註：後來發現有人在宿舍翻着學生的書籍，不得不制止他。)
(三)只查名單上的三十人，不合別人。凡是不屬於本案件的人，不論有無嫌疑，今天絕不能讓帶走。關於這一點，我用我自己的性命來担保。
(四)學校絕不會同意警憲來搜查學生。警憲要進來，其勢我們不能攔阻他們。我可以把學校的地圖借給他們，派校警領路。其餘一切，全都由警憲負責。中西教職員，要是有不放心的，你們可以跟在後面觀察觀察，將來有個見證也好。可是我不指派你們去，你們自己負責。(註：學生自治會要求我讓他們派人監視；我拒絕了。)

我知道警憲一定會遵守這些條件的。現在請在場的中西教職員一概退席。凡是在暑假畢業，秋季留校服務的學生，也可以退席。學生請不走動，讓警憲查看你們的身分證。
(註：林團長也說了幾句話，態度極可欽佩。學生態度謙和莊重。有一個學生站起來問，搜查之後，包圍線是否立刻解除？林團長答應在十五分鐘之內，撤去軍警。後來校西門南門，果然立時解禁。東門延遲了兩小時。據我所知道的，林團長無法負責。)

先生自己的筆迹，下面寫着「近人句」三個字，到八月三日朱先生火葬之後，我從城外廣濟寺冒雨回到清華，陪朱先生的兩個公子回到朱先生的寓所，看見朱先生的草帽和手杖還掛在過道的牆上，我只疑心朱先生尚未離開他的書房，走進書房，我又看見朱先生書案上那兩句題詩：

「但得夕陽無恨好，何須惆悵近黃昏。」

從這兩句詩，也約略可以窺見朱先生近年來的心境。假如人生五十也可以算作夕陽西下的話，朱先生的夕陽晚景真可謂「無限好」，然而誰又想得到，黃昏倏然而逝，突然降臨的黑夜就把一切給掩沒了！

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深夜，清華園。

附朱自清先生著作目錄

- 一、蹤跡(三十三年十二月亞東版)
- 二、背影(十七年十月開明版)
- 三、歐遊雜記(二十三年九月開明版)
- 四、你我(二十五年商務版)
- 五、倫敦雜記(三十二年四月開明版)
- 六、經典常談(三十五年五月文光書店版)
- 七、許言志(三十六年八月開明版)
- 八、新詩雜話(三十六年十二月作家版)
- 九、標準與尺度(三十七年四月文光書店版)
- 十、語文零拾(二十七年四月名山書局版)
- 十一、論雅俗共賞(三十七年五月遠東社版)
- 十二、精讀指導(三十七年一月商務版)
- 十三、略讀指導(三十七年一月商務版)
- 十四、國文教學(三十四年四月開明版)
- 十五、詩文影(尚未出版者一種)

茅盾等主編

小說月刊

零售每期 一元
訂閱三期 二元五角
訂閱六期 四元五角

(該辦法由即日起實行)

歡迎國內讀者直接訂閱
優待國內同行直接現批

地址：香港九龍彌敦道九九號

法辦閱訂券圓金用改

關中搶糧戰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 太原威脅戰結束後，緊接着又上演了關中搶糧戰。八月七日，高祖暉東會戰結束後的第三日，彭德懷又帶着一、二、三、四、六等五個縱隊，由黃龍山出來了，這五個縱隊雖經軍方宜已消滅了三分之二，經過三個月的整補，又復元了。在龍東之戰結束後，胡宗南將軍對京滬記者團表示過，三個月後共軍會再來，果然不出所料，又來了！

這次共軍發動太原的威脅戰，用兵力相當大。原駐晉南的八縱、十三等都調到晉中去了，彭德懷的二、三兩縱隊由門東渡到晉南填防。戰心在太原，胡宗南的大軍也不得不轉往一部到別的戰區去。第卅師(原來守臨汾的部隊)指揮官魯崇或(西北軍孫連仲的舊部)戰鬥力很強)空運糧食。另外第××師奉命由陝北邊境出盧山進擊魯西，負有收復平陽的任務。這兩個師一調，陝境的防守力量當然空虛了。胡宗南

看準了這一點，所以在共軍尚未發動攻勢前，先下手為強，派了一個師進擊黃龍山區，並且收復了邵陽韓城兩據點。這一行動，只能解釋為以攻為守，因為一個師的兵力決不可能肅清黃龍山。太原之圍尚未解除，正殺得難，難解之時，晉南的共軍二、三縱隊又悄悄回到陝境，而且會合一、四縱隊，避開鄜州地區的國軍，直擊城北郊楊家莊一帶國軍第卅六師的防地。卅六師是鹿東軍擊戰中打得出色的一支部隊，彭德懷很吃了他一記虧。這次免了路，他又砸上了，共軍運用了優勢兵力，包圍了卅六師的兩個團，據官方發表，一個團於消滅三倍以上共匪後全部壯烈犧牲。南京方面也承認國軍小有損失，比起宜川之失來，這次國軍的損失是不算太大。共軍消滅了城北郊的守軍後，指迴洛城，城內的守軍為了避免再被吃掉，已經大舉自衛，克復了陽，韓城的那一支國軍，陷於完全孤立狀態中，不得

不向西南方向撤退。在陝南商縣一帶整補訓練的前敵卅九軍的部隊，也抽到第一線。共軍佔了洛城後，並未積極南下，而從事於將糧食東運到晉南。雖然有一支隊伍向咸(陽)同(官)支綫攻擊，但也只是牽制國軍的兵力，使國軍不敢調離同官白水這一帶煤礦區。官方早判斷共軍一定會南下到關中平原來搶糧，所以政府也曾下令鄰近共區的各縣餘糧必須於收割後一月內運到後方來，由軍隊任保護。命令歸命令，事實歸事實，關中金黃的麥地，終於引來共軍的攻擊，國軍雖然集結了兩個師左右的兵力向洛城反擊，可是共軍為了持護物資的東運，堅強地抗拒國軍的進攻，兩個多星期的時間，共軍可能已完

成護運的行動，截止筆者屬目時止，洛城尚未收復。日後洛城可能重歸國軍手裡，但麥粒已隨風而逝矣。這次關中之戰，曾作是一種試探戰，或稱之為物資戰亦可，因為共軍沒有擴大襲擊的範圍，也沒有與

國軍作正面的大戰，共軍主力又轉移到山區。這次較長直接引發的原因是關中防務空虛，更大的原因是因為陝北共區今年荒歉特甚，共方在陝北普遍發動救災運動，他將晉南的糧食運來陝北濟荒。這些糧食，只有從關中取得補償，從晉南運糧到陝北，再從關中搶糧運晉南。這一轉運，間接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成功。陝北的人民吃到共方發放的糧食，當然會感激；晉南人民有到共軍從陝西運向糧食，直覺上感覺到是減了他們的負擔。

總統統陝後，胡宗南決定，只有胡宗南出兵河南一項免了現。補充並擴編馬家軍免現了一部份，其他人事上的決定仍是草案。張治中任西北軍政長官已是修改案，最重要的軍事指揮系統還沒有得一個決定。馬步芳的部隊駐地地區也沒有解決。馬鴻逵所部仍在三邊，眼看著榆林可能成為共軍的攻擊目標。現在榆林的防守部隊系統很複雜，有胡宗南的×個團，有陝

西保安團，有馬鴻逵的騎兵隊一部份。鄧寶珊雖名為一管陝北邊區總司令，可是只是一個光桿司令，手中無一兵一卒，無一支基本兵。鄧氏本人這次在西安留了很長的日子，結果得到胡宗南的同意，藉得指揮榆林各單位的軍隊的權力，並解決了武器問題。至於糧食，要靠作義的幫忙了，因為按榆林的糧食只有依賴後運。

最近胡宗南派他的秘書長龍文(即胡宗南副團長)到北平向作我請教，糧食問題，這在胡將軍個人，是當天荒之舉，因為打仗的事應該有一交代。

胡將軍是很少向人求教的，尤其是打共產黨，胡將軍更是年資經驗俱足。現在反而向作我請教，這表示他能接受過去的教訓來集思廣益以救國。除此之外，另一重要任務據說是商討華北與西北軍事關係上的問題，尤其是晉南的戰局與政局。卅師空運到太原後，胡將軍的指揮權已入華北，閻老將軍的地盤，傅作義不好意思去管，可又不得不管，現在由胡將軍代傅作義去管，在閻錫山面子上，較為過得去。因為傅之口實沒有直接的關係，這一既成事實，胡傅之間當然應該有一交代。

董劍主陝，搶軍從政，由軍長而主席，在董氏似乎高升了一部，可是政治比軍事難搞，陝省府人事經過一個多月的折衝和暗鬥明爭才發表。這一個月中，董劍是精疲力竭，為人事而傷腦筋。改組後的省政府，到底是不是比前任的好，尚待事實證明。不過董劍對此主席，實在沒有大興趣。棄之不能，攬之不得，就任後第一次記者招待會稱病不來，由秘書長蔣堅忍代為宣讀一篇對「改革幣制」的感想。草草終場。說來說去，今後陝局仍只有看胡宗南將軍一人來表演！(八月廿八日)

胡宗南的×個團，有陝西保安團，有馬鴻逵的騎兵隊一部份。鄧寶珊雖名為一管陝北邊區總司令，可是只是一個光桿司令，手中無一兵一卒，無一支基本兵。鄧氏本人這次在西安留了很長的日子，結果得到胡宗南的同意，藉得指揮榆林各單位的軍隊的權力，並解決了武器問題。至於糧食，要靠作義的幫忙了，因為按榆林的糧食只有依賴後運。

今日之韓國

潘公昭著

每冊金圓券二元一角

韓國位於中美蘇三強國之間，戰後南北兩部分別在美蘇佔領之下。中韓在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超過其他國家的密切關係。本書把韓國的自環境、歷史沿革、民族生活、政治黨派、解放運動、社會現象、文化學術，作扼要而正確的介绍，要研究戰後新興之韓國者，不可不讀本書。卅二開本二百四十餘面。

最近出版新書

- 今日的外國... 潘公昭著... 一元九角二分
- 現代的美國... 潘公昭著... 一元八角
- 今日的印度... 潘公昭著... 二元一角六分
- 今日的台灣... 潘公昭著... 三元九角六分
- 台灣見聞錄... 周文德著... 三元九角止
- 中國科學公司發行... 一元八角止

歡迎選購 歡迎批發

中國科學公司發行

上海(16)中正路五三七號 電話七四四八七

鄧錫侯遲不赴任的原因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成都通信)

六月更，當鄧錫侯回到成都的那一天，大風颯山機場歡迎他的盛況，是王陸基在四月裏來川上任時的歡迎情形所不及的。他的僚屬們擺成了示威性的壯大的行列，向他鼓掌致敬，他在軍樂悠揚中步下飛機，就已經感動得一羣羣的動人的。之後，他就躬身微服，在昏昏的春熙路上，或柳暗花明的望江樓邊，一狀頗開送一的散起步來了。四川年年不絕的災潮、饑、火災、饑餓似的的婦徵兵、以及永無止息的政治上的明爭暗鬥，逼得他去掩蓋主席的寶座；然而如今，他卻不再若再操心，而學生們也不會再向他遊行高喊：「打倒三督公」了。

於是，他仍舊回到錦江之畔，做起百花潭的主人來。他返川後同舊部統統了三個月的假，便在那竹筴天內，上蔽日的一席之內，穿上麻布大褂，搖扇迎風，抗拒暑病，而沉溺於自彼岸書香傳來的晨鐘暮鼓裏。

然而，一個沉溺於海濱中的人物，是永遠得不到安慰的。政治上得勝的戰雲，將永遠瀰漫地打擊着他。他三病裏飛京，旋去滬濱養病，丟掉了省主席的頭銜，但被來的川陝甘邊區，任職的職子，却更爲沉重。他從前的責任是一安川一，現在却安他出川一。鄧錫侯原也是以一圓滑一見稱的，他何嘗不知道前途的險惡，但爲了保住本身的地位，爲了他的部屬向他要飯碗，如果眼前是一付枷鎖，他也無法一肩脫一。

因此，鄧錫侯是憂鬱的。八月十日，在成都市立第一中學各界歡迎會中，各界代表紛紛發言，對鄧錫侯先生，有極高的評價，但鄧錫侯先生，卻始終一言不發。他雖然在會後，曾對記者說：「我此次回川，是受中央之命，來川主持軍政，我對川民，是有極大的責任的。」但從他的言談中，卻可以看出，他對於川民，是有極大的同情心的。他對於川民，是有極大的同情心的。他對於川民，是有極大的同情心的。

關係，以致鄧氏心有餘而感實力缺乏，深恐有負鄉人期望，將候中央兵力穩定後，方能定期赴任云云。其實，這也不是爲奇的；王陸基及其省府要員，早在七月裏就曾擬設一歡迎一過他，作陪都的中央軍校校長關麟徵，席間大家都請鄧立赴漢中就任。七月廿五日，留學的國代表委及省參議員二百餘人，曾當面希望他早日赴任，以副川省人民的期望。但是，他始終一言不發，又對市外一帶，有一，但仍外也。這一切，他仍不肯赴漢中赴任，不肯赴漢中赴任，不肯赴漢中赴任。

鄧錫侯爲什麼遲遲不肯赴漢中赴任，不肯赴漢中赴任，不肯赴漢中赴任。他對於川民，是有極大的同情心的。他對於川民，是有極大的同情心的。他對於川民，是有極大的同情心的。他對於川民，是有極大的同情心的。他對於川民，是有極大的同情心的。

鄧錫侯遲不赴任的原因，是複雜的。他對於川民，是有極大的同情心的。他對於川民，是有極大的同情心的。他對於川民，是有極大的同情心的。他對於川民，是有極大的同情心的。他對於川民，是有極大的同情心的。

(下接第二頁)



何其芳的轉變

沈宗澂

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現實生活無形中就決定了作品的內容，而作品的內容又影響到作品的形式，成功的文學作品沒有不是從作者自己生活中體驗出來的。一個過慣優裕生活，從來不懂得貧窮的人，決不會歌詠勞動飢渴；終身流離顛沛的人，筆下也不會有歌舞昇平出現。對於生活中從來沒有過的東西，根本便不易了解，假若硬要憑想像強寫出來，寫出的東西一定是浮泛的。所以非得生活中有些什麼，才能寫些什麼；生活改變了，寫作一定會自然的跟隨着改變。若干年來的民族解放戰爭使這個時代進入空前嚴重的階段，每一個人都受到現實的苦難。文學家比一般人更為敏感，當現實的鞭子打來，首先打醒了他們的幻夢，於是他們的生活開始改變了；於是我們看到當代的文學家一個一個的不再如過去一樣，在他們孤獨的房間中雕琢着身邊瑣事，抒寫着個人傷感的遭遇，而慢慢的走出了他們的斗室，發現了自己以外還有如此廣大的人民，幻想以外還有血淋淋的世界；於是他們的抒寫有了具體的對象，開始反映着這個新的生活了。這個大轉變是從個人到羣衆，從傷感到憤怒。何其芳過去曾是極端的抒寫個人的詩人，或者散文家，現在却成了最能徹底走向羣衆的一個。但何其芳的轉變比一般人來得艱難，因為他是在封建型的古老的大家庭裏長大的，深受過舊社會制度毒害的青年。從舊社會到新社會，中間並不是沒有相通的道路，但這個距離太大了。並且何其芳作了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的代表，從過去跨越現在而大步邁向未來，走上了知識份子應該走的路。

他最早的詩收在「漢園集」裏，最早的散文收在「夢錄」裏，另一部份詩文收在「刻意集」裏，以後陸續出版的詩集有「預言」，「夜歌」；文集有「還鄉日記」和「星火集」。從「夢錄」到「星火集」，前後的寫法迥然不同，不但我們奇怪「夢錄」的作者能寫出「星火集」

的文章，就是作者自己，對於這個事實也不無惶惑，覺得應該解釋一下。由華北戰場回到延安，他寫了一篇「文章」，解釋自己的轉變。他說雖然在這裏也碰見很多他那樣的知识青年，他和他們一樣的忙着工作和學習，但是需要特別解釋自己一下，因為曾經寫過「夢錄」。(「星火集」九七頁)他從許多早年遇到的小事情上找到轉變的源頭，新思想就在這些小事情上開始萌芽。

一天，走過北平一條街，一個十二三歲的寶報的小孩用可憐的聲音叫賣着，這聲音感動了他。他想到這小孩和家裏的小弟弟一樣的年幼，為什麼却在街頭求乞似的叫喚着；他想到人類不應該這樣自私自利，不能因為這小孩不是自己的弟弟，便毫不難過的走了過去。他拿出一塊錢，買了一份報。他又遭遇過一段不幸的愛情，發現了不幸的根源是社會太不合理，在不合理的社會裏難以有圓滿的愛情。大學畢業後，到天津一個中學裏去教書，早晨看着閨人的子弟坐汽車來上學，黃昏看着遠遠的烟囪，放工回家，的女工沿着都市中流出來的污水走過，他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罪惡。五二八學生運動中，學生們熱烈的開着會，呼着口號，那熱情像燃燒着的火光，照亮了他生活的陰暗。在山東萊陽，看見無數人輾轉於飢餓死亡之中，他忘記了個人的哀樂。一些喪失了土地的農民，帶着農具從鄰縣趕來作收穫時的零工，晚上露宿在石橋上。冬天，他到了青島，一排一排的別墅都空着，鎖着，他明顯的感到這個對比所代表的意義。他的新思想於是成熟了，清楚的感到必須放棄個人主義，走向人羣，走向鬥爭，運用文字成爲武器，將低微隱忍變成火辣辣的反抗的鞭撻。抗戰起來了，他決心回到四川的家鄉去作啓蒙工作，但那裏在軍閥官僚的統治下，思想文化落後得使他不能順利的展開工作，他決定離開，因爲他還需要伙伴，需要鼓舞和撫慰。他到了成都，教點書，寫些雜文，而且發行了一個小型刊物。他的文章抨擊當地濃厚的諛經空氣與視婦女和虐待兒童的封建思想，以及知識份子向上爬的人生觀。但是他並沒有找到同情他的伙伴，這又使他感到寂寞和悲哀。他開始走向一個新環境，找到快樂和光明，正如他那一一個平常的故事告訴我們的：「在這裏，當我帶着熱情和夢想談話着人類和未來，再也不會有有人暗暗的嘲笑。在這裏，我這個思想遲鈍而感情脆弱的人從環境，從人，從工作學習了許多許多，有了從來不曾有過的迅速的進步，完全告別了我過去的那種不健康，不快樂的思想，而且像一個小齒輪在一個巨大的機械裏和其他無數的齒輪一樣快活的規律的旋轉着，旋轉着，我已經消失在它們裏面。」(「星火集」二〇頁)

這種解釋是還嫌粗淺的，現在若干已經日趨末落的文人，未嘗不時時遇到這類沖激，却不見到有所感觸，更不見得因此而起來改造自己。這只是偶然的原因，不是必然的原因；只是原因的部分，不是原因的全體。僅僅是一點感觸似乎並不足促成何其芳的轉變，一定還有另外一些理由潛存於事實的背後。

在「星火集」裏，作者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他投身實際戰鬥完全由於一種寫作上的企圖——寫報告文學的企圖。他說：「是的，我應該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我應該到前線去，即使我不能拿着武器和兵士們站在一起射擊敵人，我也應該去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一〇九頁」)又說：「成了這樣一個打了敗仗的個人主義的散兵游勇，我才想到去投奔一枝苦戰了十餘年的大軍。這決心還帶着一種寫作上的企圖。我當時打算專心寫報告。」(「二〇〇頁」)這種企圖同時也就是推他轉變的一個巨大的動力，使他不得不放棄個人主義的辯護，向着羣衆走去。

何其芳的文體是獨特的。新文學運動打倒了舊有的文體，新的却未能馬上建立，各人摸索着各人的道路，各人試驗着各人的技巧，或者移植外國的寫作方法，或者在陳舊中發掘新的材料。何其芳就在這個蕪雜的場面中樹起了他獨特的旗幟。「夢錄」雖然只是十六篇短文，八十多頁的小書，却風靡一時，成爲當時散文的經典。獨特的文體奠定了他一時的成功，也正困惑了他以後的發展。

「夢錄」裏的文章完全是作者雕飾幻想的東西，幾乎沒有一篇是客觀的，像「夢後」、「獨語」、「哀歌」這些題目本身就是虛無飄渺的帶着夢幻的色彩。其中也寫到一些外景的景物，但這些景物當被作者的幻想附麗以後便現出了奇異的色彩，並不是一般人眼中所能看到的形象；其中也描寫着一些簡短的故事，但這些故事乃是爲了解釋自己，是給自己製造的玩具，我們看不出這些故事對於別人還有什麼意義。這種文章是極端的向着作者內心發展的。何其芳的散文之路，無疑的，太窄狹了，以至使他走進了牛角角。在他寫作的過程中，這種文體對於他所表現出的阻力，第一是筆下艱澀，其次是題材貧乏，最後終於寫不出來了。

「刻意集」中有兩篇東西解釋他自己的文章，「燕泥集後話」和「夢中道路」。在「夢中道路」裏他說：「我喜歡那種鏗鏘，那種色彩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我喜歡讀一些唐人的絕句。那譬如一微笑，一揮手，縱然表達着意思，但我欣賞的却是姿態。」他極力的追求顏色，精緻

